

民间手工艺变迁中的“现代化”反思

——以云南会泽民间斑铜手工艺为例

刘 羽中

(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 主要以云南省会泽县传统斑铜手工艺为主要对象, 通过描述其产生与变迁过程, 着重阐述传统斑铜手工艺在当代所面临的原材料匮乏等危机和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契机。通过对民间传统斑铜手工艺在应对“现代化”冲击时所表现出来的坚持传统与顺应现实的两难抉择的分析, 对“现代化”概念进行反思, 并且进一步探讨民间手工艺变迁中的价值冲突以及民间手工艺保护的途径。

关键词: 民间手工艺; 变迁; 现代化; 斑铜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6)03-0065-06

作者简介: 刘 羽中(1978-), 男, 云南昆明人, 法学硕士、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教师。

在民俗学的研究领域, 民间手工艺即包括整个的制造过程、生产组织与消费模式, 也包括与工艺相关的风俗、习惯和信仰。而本文则主要关注斑铜手工艺的生产制造和消费过程。从这个层面上看, 其本质是一种“技术”。

技术(Technology)在 19 世纪以后主要指“实用性的技术”, 主要涉及两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层面: 一是人们运用天然物料, 制造具有特定用途的对象的整个制作过程, technology 在这里主要指技巧(technique); 二是制作过程制造出来的制成品。而海德格尔认为当代对技术的理解, 属于工具性和以人为中心, 故科技被普遍视为达到目的的工具, 这个关于科技的全面定义, 当中包含了人的欲望和目的。并且, 他还指出, 科技并不仅是工具, 而是一种展现方式, 是人、人与世界接触而发生关系的一种模式。^[1](P67-68)]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对技术是十分看重的, 古典进化论的大师摩尔根就是根据技术水平把人类学社会的发展形态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的。^[2] 而新进化论学者怀特则利用能源的技术程度决定了文明进化的速度,^[3] 被很多学者称之为“技术决定论”。在进化论思潮的影响下, 技术进步

被看作文明进步的标志, 投射到现实社会中, 就成为代表“进步”或“现代化”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业化对“落后”或“前现代”的亚非拉地区的技术输出, 而随之带来的当地的文化和技术变迁则在“进化”的口号下变得合理。很多人类学家也基本接受了这个事实, 即变迁是不可避免的, 西方技术能够帮助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减轻贫困和痛苦。^[4](P69)]

中国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已经被欧洲资本主义列强中定义为“落后的文明”, 在与列强的交锋中屡战屡败的中国人开始思索富国之道。这时的中国社会虽然在历史和政治术语中仍然被称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表示并没有完全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 但在观念上已经把西方作为了“进步”的标尺, 只不过讨论的是“全盘西化”, 还是“中体西用”的操作化问题。虽然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制度变革, 但这一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 中国学者对技术的探讨也没有跳出“进化论”的基本假设。中国人类学的先驱费孝通在对江村蚕丝业的研究中就提出:“我工作的目的是, 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作

* 收稿日期: 2006-03-10

为原则的新工艺,来复兴乡村经济”。^{[5](P181)} 这一时代的中国学者在讨论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时都是以改良传统手工艺使之符合工业化生产为目的。

随着整个社会思潮的发展,人类学也在不断进行着反思,其中就有对“传统与现代”的反思。艾立克·沃尔夫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一书中则认为人类学所研究的“传统”其实已经是经过了资本主义改造了的。他进一步指出那些说历史是他们的人,以及没有历史的人,都成为同一历史轨迹的参与者,^{[6](P101)} 传统与现代并不是割裂和对立的而是连接的。而西敏斯则揭示出,欧洲在向殖民地输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背后的权力关系,表明当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欧洲国家消费的需要,而当地却并没有由此获得“进步”。^[7] 马歇尔·萨林斯则通过北极圈中的居民“通过利用工业技术,来实现旧石器时代的目的”的案例,提出了现代性的本土化。他认为传统的延续与变迁在很多时候是交织在一起的,全球化的同质性与地方自主性是同步发展的。^[8]

在民间手工艺变迁的实践中可以看到,“现代化”的冲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对“现代化”的反思则有助于进一步思考民间手工艺的传承与保护。而云南会泽民间斑铜手工艺的变迁过程则是用于反思“现代性”的一个十分有益的个案。

一、会泽的斑铜手工艺

会泽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乌蒙山主段,隶属于曲靖市,位于昆明的东北部,距昆明 273 km,距曲靖 254 km,面积 5 854 km²。会泽是典型的“坝子”,四面环山,地势南高北低,山地面积占 95.7%,最高海拔 4 017 m,最低海拔 695 m。境内地形复杂,起伏较大,气候分布有北亚热带、南温带、中温带、北温带,立体气候明显。

会泽在秦汉时为古夜郎地,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 年)设堂琅县,唐置唐兴县,明置东川府,清雍正五年(1727 年)复置会泽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会泽县因其丰富的铜矿蕴藏,在明清时期发展出丰富的“铜商文化”。尤其是自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因清政府对铜的大量需求,在开采、冶炼、铸造、京运等方面可谓盛况空前,会泽县城因而被冠以“万里京运第一城”。在“京运”蓬勃发展时,会泽汇集了诸多铜匠,其中张姓艺人的斑铜锻打手工艺最为独特。

会泽的斑铜手工艺大概产生于清朝雍正年间,据说是张姓铜匠祖先从大明宣德炉中获得灵感而制造出来的。当时正值会泽“铜商文化”的辉煌时期,铜运的发达也带来了会泽的繁荣,斑铜手工艺就是其中一颗比较耀眼的明珠。斑铜手工艺也因其斑驳绚烂的金属斑而被誉为“金属宝石”。传统的斑铜手工艺生产是采用师徒相承的手工作坊进行的,一般规模都不大一般铜匠都要掌握所有的工序,在人手不够的时候才考虑收徒。

中国传统的工匠都当心教会了徒弟就砸了师父的饭

碗,有对徒弟都“留一手”,张姓铜匠再授徒过程中教授的也只是一般技艺,关键部位处理的技术都是只传给自家人的。铜匠干活一般是晚上才进行,一方面由于在清朝后期,铜匠们大多都好抽大烟,晚饭后要过足烟瘾才开始干活;另一方面,也是趁晚上徒弟睡着后才开始打制一些特殊的部位。

传统的斑铜手工艺要经过“选料—净化—粗坯—成形—烧斑—整形—精加工—焯斑—煮斑—露斑—擦洗—抛光”等近二十道工序。其中烧斑和焯斑是自然铜产生斑纹的关键工序,只传授张姓家族的成员,在操作时外姓弟子也是几乎不能参与的,只有极少数的弟子有机会或有机会部分参与,或通过各种方式偷学掌握了其中的一些技术。

在整个铜商文化的颠峰,会泽斑铜也成为达官显贵的收藏品,甚至成为贡品。特别是在在 1921 年,张兴明老先生的叔伯,张宝荣、张宝华兄弟制作的铜炉参加了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并一举荣获银奖。随着近代的社会巨变,会泽铜运逐渐衰落,斑铜艺人的生活也日渐艰难。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民间斑铜手工艺遭受到更艰难的处境,但手艺人还是顽强的坚持了下来。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云南旅游业的开发又给了斑铜复兴了机会,张姓老艺人毅然地把多年来地积蓄投入到斑铜工艺地复兴中。但是由于“手艺人”与“经营者”以及“手工艺”与“商品生产”等各方面的矛盾以及艺人自身的一些局限,斑铜的复兴可谓一路艰难,前途堪忧。再加上斑铜工艺需要的天然铜矿逐渐枯竭,会泽斑铜手工艺濒临灭绝。而在而 20 世纪 70 年代,一些科技研究的专家学者和部分铜匠为了“复兴”斑铜手工艺,发明了以熟铜为原料,进行铸造方式生产的“熟斑”工艺,传统的斑铜手工艺从此分为两支。

1995 年会泽县成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兴起了以“铜商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文化产业。特别是在 2002 年到 2004 年连续举办的三届“钱王之乡”旅游文化节的推动下,“会泽斑铜”更是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宣传符号,因此在一些地方学者、商人包括少数官员的努力下,很多生产“熟斑”的斑铜厂。其中“堂琅斑铜”和“会泽斑铜”两家比较有影响力。“堂琅斑铜”得到了会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一些知识分子的宣传,是会泽“熟斑”生产企业的翘楚。而“会泽斑铜”则是依靠经营者出色的经营能力和资金的优势,迅速扩大了生产规模,成为不可忽视的一员。由于拥有者符合商业社会运作的优势条件,“熟斑”经营者取代了张姓斑铜而获得了大部分的利益。

同时也可以看到,“熟斑”虽然在质量上逊于手工锻打的斑铜,但提高的功效也降低了成本和售价,在一定程度上比“生斑”更加适合作为旅游产品,也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但是由于“熟斑”与“生斑”有着很多难以分割的联系,加之斑铜制品生产缺乏完善的行业规范,“熟斑”并没有摆脱“现代化”带来的危机。而“正宗”的手工锻打斑铜则更是面临着两难选择。

在产生了一个多世纪后,云南民间斑铜手工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几乎是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被卷入到“全

球化”的浪潮中。斑铜手工艺在其自身变迁机制与强大外力的共同作用之下,工艺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张老先生和他的侄子们的技术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但他们仍然坚持着他们的传统,在手工艺传习机制的作用下使用着不同的应对策略。张姓铜匠正面临着坚持还是改变传统的两难的选择,但他们一直在为自己的希望尽最大的努力。

二、手工艺变迁中的“现代化”反思

在对民间斑铜手工艺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一番叙述之后,有必要追问一下,什么是民间手工艺,有什么价值?从民俗学的角度看民间传统工艺是指围绕民间手工艺生产的习俗惯例,包括人工制作的工艺品的传统方法、质料处理、行业信仰、手工艺人的师承关系、禁忌崇拜,以及工艺产品本身的民俗功能和含义。而本文着重讨论的是民间手工艺的生产本身而不是由生产衍生出来的相关习俗,因此有必要对民间手工艺进行重新定义。

民间手工艺,首先应该是“非官方”的,是普通民众通过劳动实践自发形成。而手工艺就是以人力和工具加工于原料,改变其性质和形式或配合,成为制品的一种生产力量。^{[9](P1)} 可以认为民间手工艺就是民众在个体长期劳动实践中总结或创造出以人力和工具加之于自然物使之变成人工制品的生产方式。

可见传统手工艺的价值在于它的生产方式——人对自然的改造,更进一步说是人对自然不同的改造方式,即“文化的多样性”。这一价值的在于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技术模式不仅迅速地取代了各地方性传统技术的合法地位,导致了传统技术的崩溃,也使许多地方性的传统文化,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根基,并因此遭到破坏。人们已经逐渐感受到了自然界物种单一给生物界和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因此才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这一公约的初衷显然是出于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保护。而中国的一些艺术家也呼吁抢救民间艺术,抢建中国文化基因库。

民间手工艺不仅在于独特制品,更在独特的过程,而在这一个过程中被赋予了价值。民间手工艺从性质上来说是一种“技术”,在西方哲学思想中技术是人的在世的方式,这里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技术是人的在世方式;其次,技术制造作为人的在世方式,在于人如此存在,乃作为对象化的行动者即实践者;最后,人作为在以其技术制造的实践活动打开和构成视域,让作为原始现象的自然到这境域中开显。^{[10](P379-381)} 按照这样的理解,“技术”是被当成了一个文化系统,因此不同的技术也就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价值。因此,当技术发生变化时,自然会影响到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技术的变迁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文化涵化的结果。而传统手工艺的变迁正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化涵化的结果。

“现代化”是一个获取“现代性”的过程,而“现代性”则

是用来描述“现代”状态的词语,西方所言的“现代化”大抵相当于1870年—1910年这期间开始的一个时期,一直到现在。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吉登斯认为:“所谓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11](P1)} 由于“工业化”是现代性十分突出的一个特征,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工业化”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用工业化的“现代技术”取代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在清末中国的“现代化”就已提出,不过一般表述为“近代化”。而这样做的目的则是在于提高生产率。因此当传统手工艺遭遇工业化时,很容易就被取代了。

但是“现代技术”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技术发明者并非故意要摧毁先前存在的价值。但是由于传统的行为准则是建立在一个现存的对宇宙的解释基础之上,因此,挑战现存的^①标准便是向现有的信仰系统发起进攻。现代技术输入到非现代的社会,破坏了这些社会给工作、时间、权力和生命本身所赋予的意义,而带来这些变化的过程是一种“商业化”的过程。^{[12](P6-15)} 在工业化取代手工业生产后,人工制品也发生了变化,不再被理解为统一两个方面,而是两个独立的系列:手段和目的、事实和价值、功能和形式、自然和文化,而且在这种体制下,合理性专注于完善每一对的前一项而不管对第二项的后果如何。因此,现代的人工制品如此的概念化与前现代的人工制品的差别,不在于取得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合理性,而在于与传统禁忌的决裂,以便把越来越多非人类的目的加入到社会过程中去。^{[13](P272)}

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张姓铜匠的“生斑”工艺面临两难困境的原因了。在一场不可避免的变迁到来的时候,由于张姓铜匠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变迁之后,大部分锻打铜器方面的技艺都已经失传了,只剩下斑铜工艺品本身的特色,因此也失去了最有价值的方面。而在面对工业化的冲击时,由于失去了最重要的价值,如果一再坚持固有的传统则面临无法继续存在的危险^②,而如果希望转为“熟斑”而建立一种新的联系,又由于自身的先天不足的不适应,而且由于两种观念冲突也很难实现完善的转变。张姓铜匠祖先的锻打技术已经大部分失传了,而张姓家族后一辈的年轻人也没有把铜匠作为他们人生道路唯一选择,同时也并非排在首位,因此,在技术方面张姓铜匠确实是衰退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自身又不具备很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在开始生产“熟斑”以来,张姓铜匠也是举步为艰。正是由于“技术是人类的一种以取效为目标的理性活动,是一种实践方式,它有着追求有效性和合理性两个特征”。^[14] 可见,张姓铜匠若固守着传统“生斑”的生产显然不适应旅

① 原文为“现存的”,但根据上下文意,应指“原有的”或“既定的”。

② 由于最需要的原材料——自然铜的缺乏,张姓铜匠也很难再坚持下去。

游发展对旅游产品的需求,而“熟斑”制造又不能扩大规模,真正降低成本,也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销售渠道。可见,无论变与不变,张姓斑铜都无法实现最大效能的追求,也无法找到其合理性。在技术的变迁中,由于存在着价值上的冲突,致使张姓斑铜进退两难。

作为一种技术的民间手工艺可以理解为一个文化体系,可以通过其物质层面——手工制品、精神层面——工艺价值和制度层面——手工艺生产与消费的组织来理解。因此,民间手工艺的变迁其实是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工艺价值的变迁。在用一种工艺(技术)替代另一种工艺(技术)时,产品与生产消费方式都比较容易产生变化,而每一种工艺(技术)由于受其自身的机制的影响,其内在的价值可能和“新工艺(技术)”发生激烈的冲突,导致工艺(技术)的拥有者陷入到工艺价值冲突的漩涡中。在传统手工艺的“现代化”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手工艺者都身处手工艺变迁引起的价值冲突所带来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中。

然而,手工艺的变迁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机械的过程,而是人的实践的结果。无论是在不受外力干扰的自然状态下,还是面对“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巨大冲击时,手工艺变迁是通过手工艺者自身有选择的活动来实现的。而他们选择的原因又是对“现代化”的传播者、地区或国家管理决策者、产品消费者等其他群体行为的应对。每一个相关方都是基于自身的处境,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了不同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互相博弈的结构又反过来影响他们自身,成为他们下一步选择的前提。民间手工艺者的处境是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所有相关方行为的结果。在这里,手工艺和手工艺者是连成一体,手工艺的价值和手工艺者的价值相互体现。因此,手工艺面临的困境其实就是手工艺者面临的困境,而手工艺者对手工艺价值的坚持和追求其实也就是对自身价值的坚持和追求。

三、结论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包括斑铜在内的民间手工艺都遭遇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冲突的问题。而随着“全球化”不断的发展,其负面影响也逐渐被人诟病。“全球化”语境下的技术发展也带来了自相矛盾的想象:一方面是普遍化的机器系统所具有的巨大活力,另一方面是技术主导一切的升平景象的彻底破产。^{[15](P101)}这就开始了开始对“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反思,而与之相关的工业技术观也开始被检讨。从历史上看,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代表了技术价值的发展和演化的方向。^[16]有很多学者开始考虑脱离资本主义的文化体系而从其他一些曾被定义为“前现代”的文化中寻找多元的现代性,杜维明所代表的新儒家是比较活跃的。杜维明把目光投向了曾经创造过辉煌文明的中国,他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出发,重新解读经典,希望从“东亚价值”中赋予“现代性”新的意义。在对“人定胜天”的观念进行了反思之后,杜维明认为儒家所强调的“天人合一”观

念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对建立新的价值观有着积极意义。^[17]

而人类学在对全球化的研究与同质化、一体化甚至一元化相比,人类学更加强调的是地方化、本土化以及异质化的过程。^[18]而全球化在马歇尔·萨林斯看来则是一种文化的星球性重新组织,他把这种星球性组织描述为“一个由不同文化组成的文化(a Culture of cultures)”,这是一种由不同地方性生活方式组成的世界文化体系。^{[8](P123)}

对本土化和地方性的强调增加了民间手工艺存在的价值,而用“天人合一”观念来重新看待技术价值观则使得曾经被定义为“落后的”技术又被赋予了“适合的”新内涵,被认为是有利于思考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民间手工艺就已经不仅是为了保存文化多样而得到保护的文化遗产,而是新的价值源泉。这也同时为斑铜手工艺带来了新的契机。

站在“反思现代性”的立场上是支持多元文化和谐共处了,而多元文化共存也就提供更多文化接触与涵化机会。任何一种手工艺都是在不断变迁,即使是自我传习也不断在产生新的内容,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提供了手工艺变迁的更多种可能性。这就回到了一个古老的理论——文化相对论,既然在判定一个文化的价值的时候应该从该文化本身的角度出发,那么决定一种手工艺如何变迁也应该从其本身的立场出发而尽量避免强制性。

日本的民间手工艺研究在柳宗悦所倡导的“民艺运动”的推动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日本的“民艺运动”有着很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柳宗悦倡导“民艺运动”的目的就是从最能表现日本文化精神的日常生活中发掘日本文化有别于甚至优于西方“现代化”文明的价值。在积极向西方学习,欢迎“现代化”的同时,日本的学者仍然十分强调对本土文化的弘扬,仍然在寻找与西方“现代化”价值相抗衡的本土文化价值。

同样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现代化”冲击,中国民间手工艺的前途不仅需要理论思考,更重要的是付诸实践,“怎么做?”才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

根据对斑铜手工艺历史与现状的分析,可以推测会泽斑铜手工艺可能的发展趋势:

第一种趋势,是“生斑”最终消失,完全被“熟斑”所取代。这样的后果极可能是在竞争中,传统的张姓铜匠最先出局,斑铜工艺品彻底变成一种工业产品。在这里,传统文化并没消失,但其本身的意义却被重构了。而这种趋势其实已经开始了。

第二种趋势,是依然保持现状,这是目前最为合适的方式,却是最不稳定的状态,因其本身就是一种权宜之计。由于“全球化”的力量过于强大,如果没有合适的策略又得不到有效的帮助,随时都有可能向第一种趋势转变。

第三种趋势,是最理想的情况,就是“生斑”和“熟斑”相结合,满足不同的市场需要,民间艺人仍然保持者传统的生产方式成为一种象征,而工业化的生产则制造廉价的普通

消费品。但是这样的情况要求建立一整套严密的运作体系和管理机制。而且由于民间艺人本身的实力很薄弱,需要从中得到更多的保障。

斑铜手工艺在与“工业化”的碰撞中,是被湮没,还是由此得到重生,答案不应该交给未来,因为当下的一切抉择都将是最终结局的一个因素。

我们或许不能做得更好,但至少不要让它变的更坏。

参考文献:

- [1] 黄平,罗红光,许宝强.社会学·人类学新词典[Z].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 [2] 摩尔根.古代社会[M].杨东,张栗原,冯汉骥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
- [3] L·A·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 [4] 克莱德·M·伍兹.文化变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 [5]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戴可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6] 艾立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M].台北:麦田出版,2003.
- [7] Sydney W·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M]. New York: Viking, 1985.
- [8] 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M].北京:三联书店,

2000.

- [9] 高叔康.中国手工业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初版);1946(第2版).
- [10] 周昌忠.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M].上海:三联书店,2002.
- [11]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 [12] 丹尼斯·古莱特.靠不住的承诺——技术迁移中的价值冲突[M].郝立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13] 安德鲁·芬博格.可选择的现代性[M].陆俊,严耕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14] 朱葆伟.关于技术与价值关系的两个问题[J].哲学研究,1995,(7).
- [15]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M].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 [16] 李国峻,周宾.全球价值与技术价值转向[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6).
- [17] 社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18] 麻国庆.全球化: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族群、地方社会与跨国文化圈[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责任编辑:龙先琼)

Reflection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Folk Handicraft

—— Taking the Spot Copper Handicraft in Huize, Yuannan Province for Example

LIU Cho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By describing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e transition of the spot copper handicraft in Huize, Yunnan Province,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resource crisis the spot copper handicraft has met as well as the opportunities the tourist industry has brought. The embarrassed situation has called for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way to protect the folk handicraft.

Key words: folk handicraft; transition; modernization; spot copper